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独家报道·特稿

三位美国女传教士记录的日军在济宁城的暴行

图文 王明珠



①

1938年1月11日，日军侵占济宁城，此后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盘踞七年之久，犯下滔天的罪恶。

当时城内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——来自西方的传教士，他们耳闻目睹了日军的禽兽行径。其中有三位女传教士，Agnes Bartel、明峻德、司美琴，她们在晚年把这些血腥见闻诉诸文字，为我们保留了鲜活确凿的日军罪证。

Agnes Bartel： 微不足道的借口，就开枪杀人

Agnes Bartel，中文名不详。1935年至1948年间，她和丈夫Wieneke一起负责济宁北郊的一所小教堂。1980年，在接受《中国西部口述历史访谈》采访时，她回忆了日军在济宁城内的杀戮。

日军占领济宁后，在城市和乡村大肆勒索抢掠粮食、煤炭、制品和银元。因为满足不了日军的欲望，乡下的田主被迫放弃土地，另寻各种活路，或是向西逃亡。

在日本军官纵容下，士兵纪律松懈。他们经常喝醉酒，全副武装在街道上肆意横行，到处搜索袭击当地居民，为了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，就开枪杀人。Wieneke曾告诉自己的妻子，在日本人占领济宁的最初几天里，就杀死了2000多人，这不包括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人。

Wieneke是德国籍。德国是日本的盟国，日本军队承认他家这个小教堂的中立地位，禁止士兵进入教堂场地追索搜查。教堂驻地就成了附近被日本人吓坏的中国人的避难所，惊慌失措的人们纷纷逃进来寻求庇护。

Wieneke的德国国籍给了他自己一些便利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中国人。他后来告诉妻子，最初的两个多星期中，他都不敢脱衣服睡觉。因为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他随时都可能接到呼救，请他到某个难民营中去应付强行闯进去的士兵，解救下被追捕的人。在这段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中国人的时间里，Wieneke得到了济宁人的友谊和尊重。在日德同盟的影响下，这种友谊和尊重仍然没有动摇。

明峻德： 日军司令官允许士兵们放纵三天

明峻德，原名Olive Smith Bertha，美国南浸信会驻济宁的女传教士。在自传《Go Home and Tell》一书中，她记录了日军轰炸济宁城、欺凌妇女的情形。

1937年10月份起，济宁城内就挤满了来自已被日军占

领的北方城市的难民。这些难民暂时歇脚之后，就继续向西逃难。大量伤兵从前线运送到济宁，德门医院人满为患，高中被关闭以腾出空间，大型私人住宅被征用。一些商店被要求打包货物，将店铺改造成伤员安置点。

每天下午，明峻德都去医院帮忙救助伤员。浸信会驻地距离德门医院两英里，但明峻德坚持步行前往。她解释说，“因为一路上我会遇到许多人，他们今天还在，明天或许就不在了。”

12月25日上午9点，日军派飞机轰炸济宁城。敌军日益逼近，随着炮声越来越响亮，城里的人们愈发惊慌失措。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逃往西边。商店大部分时间都关着门，轰炸机的命中率也越来越高。

一天下午，明峻德从医院探访回来，发现一枚炸弹就落在离教堂仅隔一条狭窄街巷的地方。

1938年1月10日早晨，浸信会附近的一家大丝绢店遭到轰炸。11日早晨9点，浸信会那栋两层的砖房颤抖起来，窗玻璃都被震碎了！灰色的砖块和瓦片被炸成粉末，空气中一片



乌黑。明峻德的中式小屋被毁，教士们的住宅也塌了。其他建筑受损，大树被砍倒，还有一枚炸弹就落在离幼儿园约十英尺的地方，浸信会雇来看门的金老伯被炸死。

飞机轰炸停下后，枪炮声就响起来了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两枚炮弹打进了明峻德的房间。拇指大小的圆子弹在地板上四处散落，隔断墙上布满弹孔，有二十枚炮弹在传教场地爆炸。到下午2点时，声响惊人。下午5点，枪炮声突然停止。

“日本人像野兽一样涌入我们的城市。因为攻占了这座城市，作为奖赏，日军司令官允许士兵们放纵三天，但实际上他们逍遥了三个月之久。”

日本人进城后的第一个晚上，一群士兵就在德门医院院墙那边安营扎寨。院子里，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入口建有一些房间，里面住着前来寻求庇护的妇女和女孩。

明峻德当晚在医院里帮忙，大约6点钟，一个日本士兵闯了进来。明峻德赶到时，那个士兵正在寻找要猎取的目标，明峻德的美国人身身份唬住了他。

难民们也涌入浸信会驻地，明峻德关闭了驻地外面的大门，在墙上打通通道，以便从一个庭院进入另一个庭院。进入这驻地的唯一入口，是她房间旁边的前门，那里悬挂着美国国旗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明峻德忙着用挂有美国国旗的人力车，护送年轻女子和女孩到浸信会驻地。之前，这些女子中的一些人，不得不藏在行李箱和衣柜里，还有一些藏在房间的假隔板后面。

明峻德说，“看到邻家女孩打扮得像满脸皱纹的老妇人，真是感觉苦涩。其中一个女孩剪掉了漂亮的长辫子，扮成男孩的样子，用人力车拉着她母亲过了城门。”

一天夜里，一队日本兵搬进了与浸信会驻地相邻的建筑。受惊吓的妇女们爬上屋顶，跳到了驻地内，摔断了骨头。

明峻德为避难的女孩子们开了一所学校，日本兵以视察学校课程为由，日复一日地来骚扰。有一天晚上，七个日本兵组队到学校索要女人。明峻德堵住他们，派人去日军司令部交涉，才勉强平息下来。

还有一天，一些士兵爬上学校旁的屋顶，看到了女教师，便索要“那个戴眼镜的女人”。明峻德和他们僵持了长达一个半小时，设法把女教师安全地带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一些驻扎在学校附近建筑里的士兵，经常爬上学校的厨房屋顶，跳到校园里，惊吓到教师、学生和难民。明峻德等人不得不拆掉厨房，把墙建得高高的，阻止这群红了眼睛的日本兵翻越。

直到这年9月，为了制造“中日亲善”的假象，日本兵的猖獗行动才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。

1941年12月8日，明峻德被拘禁，学校解散。一年多之后，她被遣返回美国。

腐化的、让人心生恐惧的恐怖。我们走出院子，要到浸信会教堂去，看看在战斗中那里的朋友们过得如何。走在路上，空气中弥漫着邪恶的气息，似乎触手可及。大半的商店都关门了，最好的商品都被埋了起来，以免被没收，但酒肯定是成桶成桶的被抢走，醉酒的士兵在街上游荡。一位店主告诉我们，女人，不管多大年纪，到了晚上，都要躲在田野里。我不敢相信，认为他是在夸大危险。直到有一天，我，一个基督教传教士，看到军队运来了一车妓女，竟然会感到高兴。因为，这或许可以让那些可怜的、辛苦的、不幸的小女孩逃过厄运。”

半年后，司美琴的丈夫，德门医院的院长司福莱遭到一个日本兵的枪击。

那天，一个喝醉酒的日本士兵闯进医院，挥舞着枪，要抓个女护士，司福莱和几个工作人员出去阻止他。醉酒的士兵勃然大怒，他往枪里装了五发子弹，用枪顶着司福莱，要他带自己去女病区。司福莱走了一条小路，想把日本兵引到后门，然后走到街上。发现被骗的日本兵朝司福莱开了枪，子弹穿进前胸，司福莱摔倒在路边的花坛里。狂暴的士兵走过来，瞄准司福莱的头，又一次扣动了扳机。万幸的是，枪卡壳了。士兵试着继续扣动扳机，一次，两次，枪仍旧在卡壳，醉醺醺的日本兵晃晃荡荡走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司福莱才能站起来，走进了医院。

司福莱被枪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济宁城，日军司令部下令立即封锁各个路口，严禁消息传播。戴庄教堂的一位德国李神父恰好经过医院，他以德国人的身份冒险出城，把司福莱被枪击的消息送到济南的美国领事馆。美国领事馆派了一名外科医生到济宁，司福莱才化险为夷。

司美琴还记录了李神父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他开着卡车去火车站取几箱衣服。在回城的路上，伪政府警察拦住了他，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。“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。”李神父故意对伪警察们说。被激将起来的伪警察要他把所有箱子都打开，进行检查。李神父继续故作神秘：“好吧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真想打开那些箱子吗？你们要为发生的一切负责。”伪警察们又开始踌躇不决。李神父开足了玩笑，看够了伪警察们的窘态，才凑过去小声说：“兄弟们，这些箱子里有日本鬼子。如果我把它们打开，乡里就会到处都是魔鬼。”伪警察们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们早该知道李哥在开玩笑。”

这个小事意义深长。

《中国姜罐》中，留存了一位抗日英雄的剪影。司美琴夫妇有一位朋友韩福良（音译），他原本是一个长老会小学的校长，妻子是司美琴孩子的中文老师。日军占领济宁后，韩福良抛下妻儿，参加乡下游击队，当了队长。

1940年夏季的一天晚上，韩福良偷偷回城看看妻儿。有汉奸向日本人告密，日本人在火车站抓住了他。司美琴家的厨师告诉她这个消息时，言语神情间都洋溢着敬佩。“你知道王老三听到他对抓他的人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‘是，我就是你的敌人。我过去跟你们对着干，将来还会跟你们对着干。’校长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日本人很精明，他们意识到，对占领军来说，这样一个忠诚的人很有价值，值得争取到自己这边来。日本人用尽了办法，想让韩校长投降。当日本人发现威逼、劝说、利诱、承诺都不能动摇韩校长分毫时，他们就让他妻子来决定他的生死。“如果你能说服他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就放了他。”他们对她说，“否则，他将被处决。这完全取决于你。”

发现不能动摇韩福良妻子的意志后，日本人又试图利用两个孩子。

“你们不想让你爹死吧？”他们说，“你们进去告诉你爹，他如果能给我们做事，就可以活下去。现在他就能跟你们和你们的娘一起回家了。”

但是那两个小孩子非常勇敢，他们说：“爹，日本兵让我们劝你投降，给他们做事。但是你做了该做的事。”

日本人没有杀死韩福良，他们知道韩福良和司美琴一家的关系，想借用他构陷司福莱，制造司福莱等人是美国间谍的虚假证据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审，历经折磨，但日本人一无所获。

这年冬天，日军换防。一天晚上，一位日军的韩国翻译偷偷过来对韩福良说：“整个驻军都在换防，我是唯一知道你在这里的人，这也许是你逃出去的好时机。”奄奄一息的韩福良逃出了魔窟。

可惜的是，在济宁现有的史籍档案中，没有查找到司美琴笔下这位抗日英雄的任何线索。

1941年12月9日，日军逮捕了司福莱，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，他们被监禁在自家院子里。只有司福莱被允许在日本兵的押解下，到医院里继续就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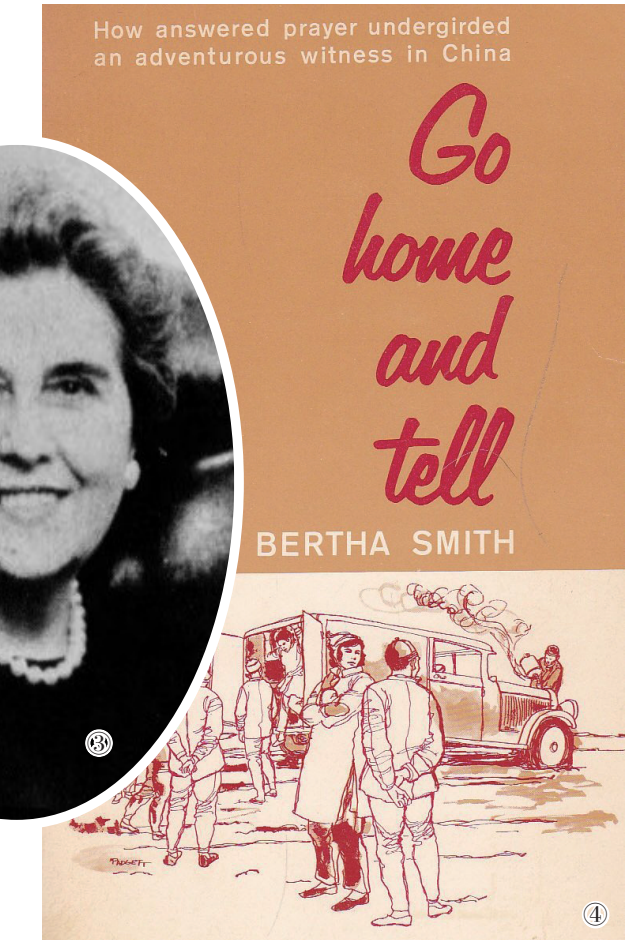
1943年的春天，司福莱夫妇感觉有不可预测的危险会随时降临，他们开始到处藏匿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司福莱在房间里筑了一堵假墙，再涂上一层灰泥，伪装出一个夹壁来，把珍贵的胶片放到两堵墙的中间。孩子们爬到屋檐下隐蔽的凹陷处，把最喜欢的画藏在里面。在一个旧樟脑盒子里，司福莱装满了结婚时用的银器，封好，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白铅，然后把它埋在门廊下的一个深洞里，一起埋在那里的还有他收藏的邮票，红木家具被藏在阁楼的烟囱后面。

他们的预感应验了。1943年3月初，他们被押送到潍县的集中营。司福莱一家在潍县集中营关了六个月后，作为第一批交换战俘回到美国。

世纪之交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打算拆除司福莱一家居住过的那座房子时，逃过日本兵搜刮、破坏的珍贵胶片重见天日。

司美琴： 这座城市被一支日本军队任意摆布

司美琴，原名Myra Scovel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。她是一名护士，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。1931年，她与丈夫F.G.Scovel博士（中文名为司福莱）来到济宁，管理德门医院。在济宁，他们一直生活到1943年。1962年，Myra Scovel出版《中国姜



罐》（《The Chinese Ginger Jars》），回忆了她们一家在中国的经历。

书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了日军占领下的济宁。

1938年1月11日下午，司美琴注意到飞机越来越低，炮声也越来越响。她匆忙走出医院，看到飞机在扫射自家院子和附近的道路。司美琴紧贴着高高的院墙，避开子弹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家里跑。孩子们还在楼上，她要尽快带他们去地下室。身后响起汹涌的人声，她转过身来，发现中国军队正在撤退。

战斗只持续了三个小时，但感觉好像过了三年。

第二天早上，每家商店门前都挂着一面日本旗。

司美琴写道：“这座城市被一支日本军队任意摆布。这支军队被允诺能自由进入这座城市，而他们却以罄竹难书的方式利用了这种自由……成千上万的男人、女人，还有孩子们，成群结队地涌入院落寻求庇护。因为没有足够的容身之处，我们不得不将数千人拒之门外，这令人心碎。”

“军事上的胜利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——一种邪恶的、

腐化的、让人心生恐惧的恐怖。我们走出院子，要到浸信会教堂去，看看在战斗中那里的朋友们过得如何。走在路上，空气中弥漫着邪恶的气息，似乎触手可及。大半的商店都关门了，最好的商品都被埋了起来，以免被没收，但酒肯定是成桶成桶的被抢走，醉酒的士兵在街上游荡。一位店主告诉我们，女人，不管多大年纪，到了晚上，都要躲在田野里。我不敢相信，认为他是在夸大危险。直到有一天，我，一个基督教传教士，看到军队运来了一车妓女，竟然会感到高兴。因为，这或许可以让那些可怜的、辛苦的、不幸的小女孩逃过厄运。”

半年后，司美琴的丈夫，德门医院的院长司福莱遭到一个日本兵的枪击。

那天，一个喝醉酒的日本士兵闯进医院，挥舞着枪，要抓个女护士，司福莱和几个工作人员出去阻止他。醉酒的士兵勃然大怒，他往枪里装了五发子弹，用枪顶着司福莱，要他带自己去女病区。司福莱走了一条小路，想把日本兵引到后门，然后走到街上。发现被骗的日本兵朝司福莱开了枪，子弹穿进前胸，司福莱摔倒在路边的花坛里。狂暴的士兵走过来，瞄准司福莱的头，又一次扣动了扳机。万幸的是，枪卡壳了。士兵试着继续扣动扳机，一次，两次，枪仍旧在卡壳，醉醺醺的日本兵晃晃荡荡走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司福莱才能站起来，走进了医院。

司福莱被枪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济宁城，日军司令部下令立即封锁各个路口，严禁消息传播。戴庄教堂的一位德国李神父恰好经过医院，他以德国人的身份冒险出城，把司福莱被枪击的消息送到济南的美国领事馆。美国领事馆派了一名外科医生到济宁，司福莱才化险为夷。

司美琴还记录了李神父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他开着卡车去火车站取几箱衣服。在回城的路上，伪政府警察拦住了他，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。“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。”李神父故意对伪警察们说。被激将起来的伪警察要他把所有箱子都打开，进行检查。李神父继续故作神秘：“好吧，这是你们自找的。真想打开那些箱子吗？你们要为发生的一切负责。”伪警察们又开始踌躇不决。李神父开足了玩笑，看够了伪警察们的窘态，才凑过去小声说：“兄弟们，这些箱子里有日本鬼子。如果我把它们打开，乡里就会到处都是魔鬼。”伪警察们听了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们早该知道李哥在开玩笑。”

这个小事意义深长。

《中国姜罐》中，留存了一位抗日英雄的剪影。司美琴夫妇有一位朋友韩福良（音译），他原本是一个长老会小学的校长，妻子是司美琴孩子的中文老师。日军占领济宁后，韩福良抛下妻儿，参加乡下游击队，当了队长。

1940年夏季的一天晚上，韩福良偷偷回城看看妻儿。有汉奸向日本人告密，日本人在火车站抓住了他。司美琴家的厨师告诉她这个消息时，言语神情间都洋溢着敬佩。“你知道王老三听到他对抓他的人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，‘是，我就是你的敌人。我过去跟你们对着干，将来还会跟你们对着干。’校长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日本人很精明，他们意识到，对占领军来说，这样一个忠诚的人很有价值，值得争取到自己这边来。日本人用尽了办法，想让韩校长投降。当日本人发现威逼、劝说、利诱、承诺都不能动摇韩校长分毫时，他们就让他妻子来决定他的生死。“如果你能说服他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就放了他。”他们对她说，“否则，他将被处决。这完全取决于你。”

发现不能动摇韩福良妻子的意志后，日本人又试图利用两个孩子。

“你们不想让你爹死吧？”他们说，“你们进去告诉你爹，他如果能给我们做事，就可以活下去。现在他就能跟你们和你们的娘一起回家了。”

但是那两个小孩子非常勇敢，他们说：“爹，日本兵让我们劝你投降，给他们做事。但是你做了该做的事。”

日本人没有杀死韩福良，他们知道韩福良和司美琴一家的关系，想借用他构陷司福莱，制造司福莱等人是美国间谍的虚假证据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审，历经折磨，但日本人一无所获。

这年冬天，日军换防。一天晚上，一位日军的韩国翻译偷偷过来对韩福良说：“整个驻军都在换防，我是唯一知道你在这里的人，这也许是你逃出去的好时机。”奄奄一息的韩福良逃出了魔窟。

可惜的是，在济宁现有的史籍档案中，没有查找到司美琴笔下这位抗日英雄的任何线索。

1941年12月9日，日军逮捕了司福莱，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，他们被监禁在自家院子里。只有司福莱被允许在日本兵的押解下，到医院里继续就诊。

1943年的春天，司福莱夫妇感觉有不可预测的危险会随时降临，他们开始到处藏匿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司福莱在房间里筑了一堵假墙，再涂上一层灰泥，伪装出一个夹壁来，把珍贵的胶片放到两堵墙的中间。孩子们爬到屋檐下隐蔽的凹陷处，把最喜欢的画藏在里面。在一个旧樟脑盒子里，司福莱装满了结婚时用的银器，封好，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白铅，然后把它埋在门廊下的一个深洞里，一起埋在那里的还有他收藏的邮票，红木家具被藏在阁楼的烟囱后面。

他们的预感应验了。1943年3月初，他们被押送到潍县的集中营。司福莱一家在潍县集中营关了六个月后，作为第一批交换战俘回到美国。

世纪之交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打算拆除司福莱一家居住过的那座房子时，逃过日本兵搜刮、破坏的珍贵胶片重见天日。

Agnes Bartel、明峻德、司美琴三位女传教士和她们的家人与朋友，既是济宁沦陷时期的目击者，也是血火磨难的亲历者。她们没有凭借特别的身份自求保全，而是秉持人道主义精神，借着那点脆弱的权力，努力与日本占领者周旋，撑起一小片一小片薄薄的屋檐，庇护了一些柔弱的生命和尊严。

她们笔下的济宁城，既有日军铁蹄下的哀鸣，也有普通人的勇敢抗争；既有教堂围墙内的庇护，也有游击队员的铮铮铁骨。这些跨越国界、超越时空的见证，是对侵略暴行的控诉，更是对人性的礼赞。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，我们重读这些文字，那些被记录下的哭喊与抗争、恐惧与勇气，依然能穿越时空，直击心灵。

和平不是历史的必然，她是需要每一代人用良知与勇气去守护的珍贵礼物。

①明峻德与德门医院一位中国护士的合影

②《The Chinese Ginger Jars》（《中国姜罐》）封面

③司美琴夫人

④《Go Home and Tell》（《回家倾诉》）封面